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_下载链接1](#)

著者:周作人 著，止庵 校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一直很喜欢周作人的书，现在很少有人想什么写什么，不说他的文笔如何，单是这份真就难得可贵。

最这套书还是很喜欢的，要是精装更好了。十月文艺真心不错，良心出版社，尊重作者，顾及读者。

非常喜欢周作人的作品，活动时买的。在京东买书很放心。

很精美的书 呵呵 这套书很值得 周作人的作品很不错

好很好超级好，值得阅读

所以我多写了11个字，这个书吗，我也还没看

“你虽然把所有该读的书都读过不止一遍，可似乎你总是大谈文字世界退化衰微的观点，对未来总报以阴郁与悲观的认识。经典作品推波助澜着你的思想，却也把你未来的希望，考验得无影无踪了。你把美好留恋在过去，把消沉留给了未来，因为你觉得经典永远是过去的。呵呵，我自然也是认同你所说的，但我还是属于坚定而乐观的未来派。”彭彭像是从丁满的眼睛里数着天上的星星，注视着丁满那貌似充满寓言的双眼。

知堂名作，必备。平和 散淡，回味绵长。

周作人自编的集子 北京出版社出的 非常好 就是价格定得太高了

活动时收的，书很好，经典作品，值得一读。快递很快，包装也很好！

精致,很喜欢,搞活动5折入手. 和沈从文别集一样

一本一本随着出版随着就都买了，虽然赶上活动买的，还是有点小贵。

都是帮朋友买的，他是外国人哦，超喜欢中国文化。

活动购入，好书慢慢看

想买的一本书，看了很久，一直没有啥活动，不到二十元的价格就买了。北京发货，所以送货速度还可以接受。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要想知道周作人，只能尽可能的读他的书

周作人散文自编集系列之一。

包装都烂掉了 其他还不错

非常超值的好书，装帧、纸质、印刷都不错

好书何其多，读书滋味长！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封面素雅，非常喜欢。

自编辑必收书，开本适合阅读

周作人的这套自編集出了的都买了，很喜欢。

陆续买齐这套新编辑的文集。

很不错的书，值得购买。

这个书的内容就不用多说了，装帧设计也不错

好好好好好好

活动很好，多多益善.好书低价不亦乐乎

虽然纸张不是很好，但还是再买一套吧。

有时候好东西买来不急看，是为了囤积

精致小巧，内容很好，帮同学购买

看了快一半了，对我很有启发，值得一看

周作人的自编集，很慢啊，才到第5！

很好的书，很便宜呢，送书很快！

趁着京东搞活动购买，性价比还行

趁活动买的，很合算。还在细读中

盼知堂全集问世，一直只能零星收集，上次也是止庵，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弄了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校对质量惨不忍睹。作为编辑，止庵差钟叔河远了。但钟叔河岳麓那套没出全就终止了，原因你晓得滴。目前市场上周作人的文集及译文集只有止庵在弄，不过十月文艺这版在文字校对上比河北那版改善多了，聊胜于无罢。用纸印刷还行，但总觉这套弄的不够大气。装订不行，书脊易开裂。不过止庵弄得《周作人译文全集》还是不错的，只是封面弄得不行，我较喜欢的封面书名题字是用作者本人的手迹，好多大家的书好像都是这样。

很好看的书，精彩，印刷很不错。

书的品相不错，京东的服务很好！

周作人的散文有劲道，有韵味。

质量可以的好书了性价比高的

周作人自編集终于出到第五辑了

送货速度快，好！价格便宜

给力的京东，给力的活动！！！！

这本书不错，值得收藏。

很不错的好书，值得购买

这套书都很不错，值得品读

书的质量非常好，谢谢。

周二先生的文字，期待。。。。

周作人自編集周作人自編集

等了好久，终于出了，喜欢

经典的文章，权威的编辑

周作人的散文，必收。

很好很完美，很喜欢！！

印刷精美，值得收藏。

周作人自编集新出的一种

到货也很快，喜欢。。。

京东买书感觉一直很好!

相当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

很喜欢的一本书。

周作人（1885—1967），中国散文家，翻译家。原名櫟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人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论文《人的文学》《美文》，新诗《小河》等在新文学运动中均有重大影响。所作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平和。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有启发的书

内容很好，我是看了《雨天的书》觉得不过瘾又买的。但是书的外套膜有破损，弄得里面有点脏了，小遗憾！

值得推荐的书

纸张印刷都不错。21篇8万多字（以作者自序为准）。可惜同河北教育那一套同是标准32k大小，每页少印2行，增加了读者负担，有卖纸张之嫌。

以前不喜欢周作人,觉得他的文章太散太慢太淡,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可以接受他了.准备将这套《自編集》收齐。

这套书很不错，装帧也好，唯一的不足就是价格贵，比之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贵好多，但是那套书现在买不到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虽然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但知堂老人的文笔却真是没有几个能比。

活动价格购买，不错。

苦茶先生的作品。为了集齐自編集。

就是要自提麻烦！麻烦！

这回外边加个包装箱,书品好多了,还不错

其实做成标准的32开反倒大气一点。

周作人的这套自编文集想买全了。

印刷 用纸比较好 印刷 用纸比较好

从装帧到排版到内容。。啧啧

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其精神人格對後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產生屈原那樣的文化效應。兩千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寫下了無數與屈原有關的篇章，他們以各自獨特的生活經驗和生命感悟闡釋了屈原偉大人格的精神內涵。例如唐人戴叔倫的“昔人從水逝，有客吊秋風。何意千年隔，論心一日同”的感慨，就是很好的例子。陸龜蒙“豈知千麗句，不敵一讒言”以及孟郊“九門不可入，一犬吠千門”的抱怨也似有感而發。屈原的偉大人格和不幸遭遇深深地感動了他們，屈原偉大的精神品格成為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人格美的典範。

：这本里的重量级是《我的杂学》和《灯下读书论》，前者注重读书内容，后者是知堂读书之要领，想起最近几年的读书甘苦和疑惑，真觉知堂此文如我肺腑所出，字字珠玑，梦想如抵掌而谈，满座生春。苦雨见识超出同辈太多，文章又做的漂亮至极，徒让我辈既感且叹，高山仰止，恨不得亲见其人，亲聆其教，乃录全篇于下云云：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很好！

i like this book

Very. Good!!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记云：“又拟集短文为一册，曰‘书房一角’，其中包含‘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书房一角》列为“艺文丛书之一”，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从前引日记可知，“看书余记”先不在其列，乃是后补入的。全书四辑中又以“看书余记”（最初在《晨报》副刊发表时，总题为“药草堂题跋”）起手最早，还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待到写完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看书偶记”开始陆续发表，二月“桑下丛谈”亦有个别篇章面世，这两部分写作或许稍早于“药堂语录”（首次刊载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完成则在其后；“旧书回想记”写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十月，一这大概也是全书完成时间。

《知堂回想录·从不说话到说话》介绍此书缘起说：“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一九三八）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后来集有二百多则，并作一集叫作‘书房一角’。”《读东山谈苑》（以写作时间计大约是集中第一篇）则说：“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多少道着作者当时心境。作者此前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文得失。余下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已经预告了《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的主要内容和思想特色。“风趣今且不谈，对于常识的要求是这两点：其一，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其二，知识上是唯理的思想。”（《一蓑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这是他对前人笔记的选法，也是他自己笔记的写法。《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不是当文章写的，思想含量却不小，文化批判精神仍然贯穿始终，一这包括“疾虚妄”和“爱真实”（或者说“重情理”）两方面，从前者出发排斥某些东西，从后者出发则收纳某些东西。而且因为所涉古籍甚多，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两本书完成的。

质量非常好，与卖家描述的完全一致，非常满意,真的很喜欢，完全超出期望值，发货速度非常快，包装非常仔细、严实，物流公司服务态度很好，运送速度很快，很满意的一次购物,希望再接再厉，一直保持这样的，要大赞的是客服的态度与效率，买之前提了很多的问题，解答的都很满意，还会再来光临！挺好的，以前重来不去评价的，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积分，自从知道评论之后京豆可以抵现金了，才知道评论的重要性，后来我就把这段话复制了，走到哪里，复制到哪里，既能赚京东，还非常省事，特别是不用认真的评论了，又健康快乐又能么么哒！这是我复制过来的，我自己懒得写了，但这也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

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京东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至少85分以上，而比较垃圾的产品，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会影响该商品销量，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质量跟服务态度。

大概人老了或者失意之时，都免不得要说些朴素的话，讲讲过去的经历，总结一下读书、治学、为人的经验，供后来者鉴往知今不无裨益，周作人的《苦口甘口》大抵可作如是观。

《苦口甘口》1944年11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收文21篇，序言1篇，从1943年9月始，至次年8月迄，写作时间跨度约为1年。对周作人来说，1943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年的2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批准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辞呈，周作人遂从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位置上下来，结束了两年零一个月的“督办”生涯。周氏之离任，非是自愿，乃是被炒鱿鱼，此月伪华北政府改组，是因为伪国民政府认为王揖唐主政的伪华北政府不能把华北建为日本的后方兵站基地，原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全体委员遂集体辞职。对于“督办”一位，周作人实际上颇为留恋，2月6日下午，汪时璟来访，传达了朱深（后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让其出长伪北大校长意，实际上即批准了周作人辞职。周颇为不悦，当晚日记云：“汪翊唐（即汪时璟）来，述朱三爷（即朱深）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手段亦仍如髯公（即王揖唐），思之不快良久”。10日伪华北政府改组完毕，除王揖唐外，只有周作人落选，这让他十分恼火，当晚日记悻悻然曰：“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舒鲁（王克敏）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复，常用手段故如是也。”17日日记云：“下午甚不快，阅毛诗疏消遣。”得意时是儒，失意时是道，终周作人一生，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丢官失爵后的周作人，开始怀念故人，思考为官得失，变而向道为文了，如作《怀废名》，《武者先生和我》（收《苦口甘口》）等，都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和自己苦闷之意。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原名櫟寿（后改为奎綬），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红卫兵抄家，1967年病逝。

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散文全集》共600多万字，收录了周作人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盖了《周作人文类编》和《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并有超过1/3的集外文和未刊稿为首次出土面世，对全面了解周作人及其作品有极大助益。全集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了周作人1898至1966年的作品，所有

文章均一一考订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所用署名等，同时注明集内文、集外文和未刊稿，并配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索引卷60余万字，分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为读者及研究者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对于大部分不熟悉前苏联文学历史的读者，这似乎又是一个巨大声名主要来自于身后的俄罗斯作家。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伊萨克·巴别尔就已经是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了。而为他带来荣誉的，只是两部薄薄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当大多数苏联作家把眼睛盯着大时代、大事件时，巴别尔把视点坚定地落在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身上。在他的笔下人不再只是集体的一份子，更不仅仅是革命事业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有着复杂人性的生命体。残酷的战争环境常常让许多红军战士内心扭曲、变态，其中黑暗和兽性的一面令人为之心惊；但与此同时又无不渴望着幸福、安宁的生活，梦想着甜蜜的爱情。除了题材、内容方面的个性十足，质朴而生动的语言是巴别尔作品的另一个炫目的亮点。巴别尔要求自己的小说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斯丹达尔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追求的理想目标总结为“像法律文书一样精确”，他的《红与黑》、《帕尔玛修道院》也的确接近于这样的高度，而巴别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字的节省简直到了“吝啬”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加缪的作品才能与其媲美。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与巴别尔最相近的是海明威，读过《白象似的群山》后大概也会认同此观点。

《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毫无争议的代表作，由三十六个短篇组成。每篇小说既独立成章，彼此之间又并非毫无关联。这样的结构类似于福克纳的《去吧，摩西》，你可以把整部小说集当成一部长篇来看。我最喜欢其中的《多尔古绍夫之死》、《政委康金》、《盐》（据称是博尔赫斯最珍爱的作品）、《寡妇》、《拉比之子》、《千里马》、《吻》。尤其是《拉比之子》，对人物刻画之准确、巧妙都很有典型意义。这是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绣像，而且两人的像并放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决议汇编中夹着一缕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的内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写满了犹太古诗。几页《雅歌》竟然和几发左轮枪子弹搁在一起。一个半路出家的革命者内心中的矛盾、纠结真是一目了然。一九三九年，巴别尔因“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及“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间谍”的罪名被逮捕，严刑拷打后巴别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巴别尔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卡监狱被枪决。临刑前，巴别尔表示，“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当然，他没有得到满足。

他的书写得很好，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除了三十几首新诗和二百来首旧体诗外，全部都是散文。它的散文有杂感、文艺短评、随笔等类。其中，影响较大，艺术成就较高，风格也较成熟的，还是他那些以冲淡平易见称于世的美文小品。他这些美文小品，不仅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精湛的艺术造诣。同时，也形成了周作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一
周作人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平淡自然、和平冲淡、闲适……这些说法都是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概括。周作人自己也曾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

①“平淡自然”，这是周作人给自己散文风格所作出的定位。“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②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不仅如此，他给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言中，也一再地强调、推崇冲淡平易的文学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冲淡平易，不仅是周作人希望达到的境地。同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冲淡平易的艺术风格。周作人的散文，多写周围的日常生活，他常写一些人人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象同友人拉家常，叙旧情。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徐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如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大多是如实的记事，虽也有内心的感情，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最激烈也不过是说一些这样的话：“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则是人功。”③，“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两位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辛亥革命后回国，曾任浙江省视学、省立第4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1924年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北京大学南迁，他受时北大校长委托留在北平，不久为了保全北大财产而降日本。1939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1年出任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49年出狱，定居北京，1967年病故。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世界语。本世纪初即通过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向国人介绍。20年代曾任北平世界语学会理事长。一生著作颇丰，共有集子50余种，如《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知堂回忆录》、《药堂杂文》等。文学专著有：《新文学的源流》、《欧洲文学史》等。译作有：《现代日本小说集》、《乌克兰民间故事集》、《陀螺》、《黄蔷薇》、《现代小说译丛》等。建国后的著作有：《鲁迅的故事》、《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周作人周作人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芾）等人留学日本。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周作人周作人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

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荪）等人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留学回国执教北大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周作人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

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葑）等人留学日本。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留学回国执教北大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周作人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

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反动老作家一》中又补充道：&b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e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f。自从董仲舒说过，‘正h其谊h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j了这牌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世功，变成k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可以说前者是&疾虚妄&和&爱真实&的总括，后者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落实，而n八股与空谈也是一种虚妄；作者长期而系统的p文化批判，以及一生的思考，就完成在这两句话里了。然而如果联系他所说的：&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s验，从s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v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x论》）那么上x述两点之被称为&梦想&，也就无足为奇了，说来只是&伟大的捕风&而已。而《灯下读书论》则A道出了他对分别作为愿望和事实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看法，他E的思想最深的根也就扎在这里。周氏在《我的D杂学》中自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H与的影响为多&，但是这里&西洋&却不是笼统讲的，更非l指其末流，而是直溯源头：&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希腊闲话》，载《新生》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二期）希腊研究亦为周氏L重头戏M之一，有关文章很多，集中《希腊之余光》即其一，作者写《过去的工作》特地针对此篇说：&这种秀才人情固P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Q希腊仍是不忘记也。&作文介绍之外，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S述，S如《希腊拟曲》、《希腊神话》、《全V译伊索寓言集》、《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等，最后遗嘱尚云：&余一Y生文字无足称X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Z，识者当自知之，但是阿波[

止庵编印周作人作品琐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凡36种，3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24开本。浅灰的封面设有墨笔茶壶瓶梅等，干净雅致。封面使用英国刚古纸，手感良佳。将作者所编集子重新出版，本是钟叔河先生在80年代做了一半的事情，时隔十余年后，由止庵完成。此外可备一述者，一是此套丛书于2001年出第一版时，其中《木片集》和《老虎桥杂诗》皆为第一次付梓。《木片集》是周作人生前已编好的集子，选录50年代所写随笔，1959年交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后转广州，再转回天津，至1963年，“得百花社寄还校稿，已两次付排而终不能出板”。《老虎桥杂诗》是周作人的旧体诗集，60年代初由谷林根据周氏借给孙伏园的原稿过录，比岳麓书社版《知堂杂诗抄》多30余首。二是《知堂回想录》当初由曹聚仁编辑交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时，错谬较多，此番则据保存下来的手稿校订，恢复原貌。《周作人自编文集》共印两次，第一刷时出版社校对略有疏漏；二刷由止庵重校，改正若干错字。而《老虎桥杂诗》则根据后来找到的作者原稿加以校订。“自编文集”第一刷与第二刷版本之别，即在于此。

《周作人自编文集》每册之前，止庵均写有短文，介绍作者创作流脉和版本情况。后止庵将这36篇文章及另外几篇谈论关于周氏著译的考证之作，编为《苦雨斋识小》出版，是一本别具特色的书话。

《周作人自编文集》出版后，止庵发现了周作人从未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学史》一书，计十万字。周氏已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缺少19世纪部分，正好由《近代欧洲文学史》补足。这可视作近年周作人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止庵与戴大洪为此书写有18万字的注释，2007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周氏著作迄无注释，此举不无草创之功，颇便阅读。

止庵编《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收《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共4册，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处不妨再引止庵语以作叙述：“一九零六年夏秋之际，周作人随鲁迅赴日本；一九二三年七月，二人失和。其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们更多呈现为一个整体，所谓‘周氏兄弟’是

也。彼此有多方面的合作……其中荦荦大端，究属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周氏兄弟合译文集》所收《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就是具体成绩。”其中《红星逸史》已是百年前译作，难得一见。而《鲁迅译文集》只收鲁迅译作，《苦雨斋译丛》与正在编辑《周作人译文全集》只收周作人译作，惟此“合译文集”才真正是按原貌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作人的著译作品出版很多，参与其事者不少，若论真有贡献者，当推钟叔河、止庵与陈子善三人。概括而言，钟氏贡献在最早系列出版周氏作品，虽因故而未竟其功，一也。以“分类”和“编年”的方式，几乎出齐周氏散文之作，又一也。陈氏贡献在搜集整理周氏的大量集外文。止庵贡献则如前所述，一，首次出版《希腊神话》、《木片集》、《老虎桥杂诗》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止庵说：“我作为一个读者偶尔涉足出版，有机会印行几种从未面世的书，与其说感到荣幸，倒不如说少些担忧：我是经历过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的人，眼见多少前人心血毁于一旦；现在印成铅字，虽然未必有多少人愿意看它，总归不至再因什么变故而失传了罢。”）；二，根据原稿恢复了周氏多本译著约三百五十余万字，还其本来面目；三，首次完整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此三者为读书人之幸事。

苏特来自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青少年时代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并先后在牛津、哈佛等名校就读。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苏特操持了两年律师业务，之后，他进入了新罕布什尔州司法总长办公室。在这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引路人——沃伦·卢德曼。卢德曼是共和党人，后来曾担任联邦参议员达十三年之久。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温和中间派，也正因此，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曾于1994年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但被其婉拒。%D%A

正是沃伦·卢德曼，在新罕布什尔州司法总长任上发现了苏特的才华，对他青睐有加，不但将之擢升为自己的副手，并在离任时敦请州长提名苏特继任总长职务。其后，也正是由于沃伦·卢德曼，苏特才得以进入州高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宣布辞职之际，苏特能够进入老布什总统的视野，也几乎完全出于沃伦·卢德曼的推动。然而，尽管苏特多年以来先后担任过新罕布什尔州司法总长和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务，但对美国公众、乃至对美国法律界而言，他都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就连他在哈佛的同学也对他没有多少印象，他们戏言，苏特可能是在耶鲁完成学业后，再回哈佛拿的学位。%D%A

不过，全国律师协会联邦法官委员会为苏特打出的分数却让人大跌眼镜。里根总统提名的罗伯特·博克担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多年，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宪法解释“原旨主义”方法在美国宪法学界自成一派，对伦奎斯特、斯卡利亚等大法官有着极大影响。但是，联邦法官委员会的十五位委员中，有四位对博克法官的评级是“不合格”，另有一位给出的评级是勉勉强强的“不反对”。而同一个委员会却在苏特被提名时一致给出“完全胜任”的最高评级。%D%A

老布什总统及其幕僚长苏努努对苏特十分满意，认为他们找到了理想中的人选。然而，正如美国宪法学者亚历山大·比克尔所说，“当你任命一个大法官的时候，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遥远的未来，他根本不可能告诉你，自己在面对问题时，到底将如何思考”，不要说老布什总统，就连刚刚通过提名听证时的苏特自己，仍然自认为是“偏向中间，但仍然在右边”的。因此，就算是苏特本人，恐怕也无法预料，在往后的大法官生涯中，自己的立场将会发生如何巨大的转变。%D%A

苏特的前任布伦南大法官，被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罗斯基誉为“这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大法官”。他不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自由派的领军人物。苏特的大法官提名听证通过之时，有保守派专栏作家欣喜若狂地宣布，“布伦南与苏特是从两个相反的极端看待宪法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苏特的上位，属于保守派的时间终于到来”。苏特却注定要让保守派大感失望。%D%A

对于苏特而言，遵循先例是普通法中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对于法治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即使在传统上较少适用先例的宪法案件当中，“这项原则也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必须具有‘特别的理由’，才能作出与先例相反的决定。”因此，作为个人，他可以批评甚至反对先例，但作为法官，在裁断案件时，他必须受到自己所反对的先例的拘

束，而不能仅从自己的道德原则出发。因此，他的朋友史蒂文·麦考利夫也准确地预言道，此后的二十年中，苏特将“是确保联邦最高法院连贯性的重要来源，成为连接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与传统的人”。

止庵编的这套书，文章全面完整，书设计清白雅致。喜爱周作人作品的值得一存。

“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我曾屡次致其赞叹之意，贤首是中国僧人，此亦是足强人意的事。我不敢妄劝青年人看佛书，若是三十岁以上，同文有根柢，常识具足的人，适宜的阅读，当能得些好处，此则鄙人可以明白回答者也。……我写这篇文章本来全是出于偶然。从《儒林外史》里看到杂览杂学的名称，觉得很好玩，起手写了那首小引，随后又加添三节，作为第一分，在杂志上发表了。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兴趣，不想再写下去了，然而既已发表，被催着要续稿，又不好不写，勉强执笔，有如秀才应岁考似的，把肚里所有的几百字凑起来缴卷，也就可以应付过去了罢。这真是成了鸡肋，弃之并不可惜，食之无味那是毫无问题的。这些杂乱的事情，要怎样安排得有次序，叙述得详略适中，固然不大容易，而且写的时候没有兴趣，所以更写不好，更是枯燥，草率。我最怕这成为自画自赞。骂犹自可，赞不得当乃尤不好过，何况自赞乎。因为竭力想避免这个，所以有些地方觉得写的不免太简略，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或者比多话还好一点亦未可知。总结起来看过一遍，把我杂览的大概简略的说了，还没有什么自己夸赞的地方，要说句好话，只能批八个字云，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而已。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得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作参考，但是其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切，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东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他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化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癖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也承认是美中不足。儒家不曾说“怎么办”，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那样，便是证据。我看各民族古圣手的画像也觉得很有意思，犹太的眼向着上是在祈祷，印度的伸手待接引众生，中国则常是叉手或拱着手。……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题作《愚人的自白》才好，只可惜前文已经发表，来不及再改正了。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五日。

浅谈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海里有鱼)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除了三十几首新诗和二百来首旧体诗外，全部都是散文。它的散文有杂感、文艺短评、随笔等类。其中，影响较大，艺术成就较高，风格也较成熟的，还是他那些以冲淡平易见称于世的美文小品。他这些美文小品，不仅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精湛的艺术造诣。同时，也形成了周作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散文的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平淡自然、和平冲淡、闲适……这些说法都是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概括。周作人自己也曾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①“平淡自然”，这是周作人给自己散文风格所作出的定位。“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②他希望自己

的文章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不仅如此，他给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言中，也一再地强调、推崇冲淡平易的文学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冲淡平易，不仅是周作人希望达到的境地。同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冲淡平易的艺术风格。

周作人的散文，多写周围的日常生活，他常写一些人人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象同友人拉家常，叙旧情。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舒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如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大多是如实的记事，虽也有内心的感情，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最激烈也不过是说一些这样的话：“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则是人功。”^③，“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两位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④。周作人关于事件本身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周作人却能冷静沉着，通过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悲愤。这就是周作人散文的冲淡平易之处，他使人读他的散文，一点不觉得艰难，甚至觉得有些浅显。然而，正是这样，才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毫无戒备和疑问中，服服贴贴地接受他思想感情的影响。

我们说周作人的散文是冲淡而不是平淡，还在于周作人的散文是有思想的，它并不让人觉得苍白贫乏。周作人虽然谈不上是卓越的思想家，但对于许多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是与非、曲与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他都能判断分明，做到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其深刻性往往为一般人所不及。这也正是他的散文不显疲弱，比较耐读的主要原因。当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之后，社会各阶层对他有种种评价。其中不乏恶意的攻讦和指责。周作人即明确指出：孙中山不是“神人”，“也有缺点”，却应“整个地去看他的伟大来。”如《故乡的野菜》，在艺术手法上可以说完全是采用“白描”的手法。用白描而能写出真挚的感情，只有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文章开头，周作人便声言他对于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份，只因为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到他。待我们读完全文，便会发现周作人对野菜的谈论，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的深情。周作人散文创作表现出的冲淡平易，决不是直露平庸，更不是淡而无味，其中充满了作者的感情。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有感情，这对于诗和散文尤其如此。问题是，周作人散文中感情的流露有其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抒情的淡化和节制。周作人的散文，总是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写成似乎颇不经意。

我的杂学 一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后来多还记得，特别是关于批评马二先生的话。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

“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又第十八回举人卫体善卫先生说：

“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到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这里所谓文章是说八股文，杂学是普通诗文，马二先生的事情本来与我水米无干，但是我看了总有所感，仿佛觉得这正是说着我似的。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我自己所写的东西好坏自知，可是听到世间的是非褒贬，往往不尽相符，有针小棒大之感，觉得有点奇怪，到后来却也明白了。人家不满意，本是极当然的，因为讲的是不中的举业，不知道揣摩，虽圣人也没有用，何况我辈凡人。至于说好的，自然要感谢，其实也何尝真有什么长处，至多是不大说诳，以及多本于常识而已。假如这常识可以算是长处，那么这正是杂览应有的结果，也是当然的事，我们断章取义的借用卫先生的话来说，所谓杂览到是好的也。这里我想把自己的杂学简要的记录一点下来，并不是什么敝帚自珍，实在也只当作一种读书的回想云尔。民国甲申四月末日。

《苦口甘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今年夏天特别酷热，无事可做，取旧稿整理，”即为编集时间。本文共二十一篇，计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八篇，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十三篇，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风格亦基本延续《药堂杂文》，谈论思想的“正经文章”仍复不少，也有一些怀人读书之作。从《苦口甘口》起，周氏进入一个“总结时期”。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分量的是《我的杂学》，作者后来说，“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知堂回想录·拾遗辛》）全面概括了他的知识构成，同时也梳理了思想源流。而有关结论则在《梦想之一》及此后所作《道义之事功化》（作者说亦可名为“梦想之二”）里有更为详尽的阐述，其要点则如作者所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我的杂学》）以后在《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中又补充道：“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自从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了这牌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世功，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可以说前者是“疾虚妄”和“爱真实”的总括，后者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落实，而八股与空谈也是一种虚妄；作者长期而系统的文化批判，以及一生的思考，就完成在这两句话里了。然而如果联系他所说的：“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那么上述两点之被称为“梦想”，也就无足为奇了，说来只是“伟大的捕风”而已。而《灯下读书论》则道出了他对分别作为愿望和事实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看法，他的思想最深的根也就扎在这里。周氏在《我的杂学》中自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但是这里“西洋”却不是笼统讲的，更非指其末流，而是直溯源头：“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周氏之“不忘记”希腊，除意欲纠正通常对于西方文明的谬误理解外，更重要的还如他一再所说，“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然而所指“中国”却非当今而是以往，或者说是以往的一种理想，这早说在《生活之艺术》里了：“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前引文所谓“知”，所涉范围甚大，核心是对文明的认识。“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也就是“生活之艺术”，在他看来，“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中庸作为周作人思想总的基调，原本得之于古希腊，不过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种契合罢了。周氏之热衷介绍希腊文明，是他所有工作中最具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项，目的还在改造国民性，“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当然这同样是“伟大的捕风”。止庵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苦口甘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自序》中说：“今年夏天特别酷热，无事可做，取旧稿整理，&”即为编集时间。本文共二十一篇，计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八篇，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十三篇，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风格亦基本延续《药堂杂文》，谈论思想的&”正经文章&”仍复不少，也有一些怀人读书之作。从《苦口甘口》起，周氏进入一个&”总结时期&”。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分量的是《我的杂学》，作者后来说，&”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

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知堂回想录·拾遗辛》）全面概括了他的知识构成，同时也梳理了思想源流。而有关结论则在《梦想之一》及此后所作《道义之事功化》（作者说亦可名为&"梦想之二&"）里有更为详尽的阐述，其要点则如作者所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我的杂学》）以后在《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中又补充道：&"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自从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了这牌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世功，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可以说前者是&"疾虚妄&"和&"爱真实&"的总括，后者是人道主义思想的落实，而八股与空谈也是一种虚妄；作者长期而系统的文化批判，以及一生的思考，就完成在这两句话里了。然而如果联系他所说的：&"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那么上述两点之被称为&"梦想&"，也就无足为奇了，说来只是&"伟大的捕风&"而已。而《灯下读书论》则道出了他对分别作为愿望和事实的人类历史的终极看法，他的思想最深的根也就扎在这里。周氏在《我的杂学》中自谓&"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但是这里&"西洋&"却不是笼统讲的，更非指其末流，而是直溯源头：&"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说起。&"（《希腊闲话》，载《新生》一九二六年第一卷第二期）希腊研究亦为周氏重头戏之一，有关文章很多，集中《希腊之余光》即其一，作者写《过去的工作》特地针对此篇说：&"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作文介绍之外，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述，如《希腊拟曲》、《希腊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等，最后遗嘱尚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是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译本高阁十余年，尚未能出板，则亦是幻想罢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周氏之&"不忘记&"希腊，除意欲纠正通常对于西方文明的谬误理解外，更重要的还如他一再所说，&"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然而所指&"中国&"却非当今而是以往，或者说是以往的一种理想，这早说在《生活之艺术》里了：&"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前引文所谓&"知&"，所涉范围甚大，核心是对文明的意识。&"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也就是&"生活之艺术&"，在他看来，&"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中庸作为周作人思想总的基调，原本得之于古希腊，不过在中国古代找到一种契合罢了。周氏之热衷介绍希腊文明，是他所有工作中最具启蒙主义色彩的一项，目的还在改造国民性，&"建造中国的新文明&"。当然这同样是&"伟大的捕风&"。

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界，春天恰如其分。那个春天百花齐放，其间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枝并蒂花，这即是周氏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以其杰出的创作成绩，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名重一时。然而，几十年之后，这枝并蒂花凭空折断了一朵：人们只认识鲁迅，不知道周作人了。周作人一直是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当年日军入侵中原，作为留平教授，文化界倾力劝其南迁，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可见其文化地位。然而，周作人还是呆在沦陷区，并担任伪职，令文化界一片哗然。于是，冠上了“附逆”“汉奸”的头衔。关于这一段历史，历来争论不一，解放后，周作人也曾亲自致信周恩来总理，作过诸多解释，却难以抹去留在人们心中的污点。而其兄鲁迅，一直以来作为民族英雄，流传不朽，真是奇怪的事啊！兄弟俩念私塾，读古书，进洋学堂，后东渡留学，几乎一样的经历，而命运如此不同，实在是性格不同所致，也无怪乎后来兄弟反目成仇了。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

师。然而，我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这是套用鲁迅评价胡适，陈独秀与刘半农的话。鲁迅人如其文尖刻犀利，除了自己谁都骂。而周作人自始至终，表现的是一种平和宽容的美，这种美溶入其散文，便是平和冲淡的风格。周氏的散文一般为闲话式的，“大至宇宙，微如苍蝇”，无所不谈。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似乎借鉴了不少。周氏的散文以文人的情趣格调为基础，因而欣赏其文也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般的人慕名来读，开始一定失望至极，认为象白开水一般平淡无味，闲得无聊。然而，等你稍稍深入散文这片田地之后，再回头来读周氏的文章，便会发现一种不可言说的美，正在其平淡闲适之间。

周氏的散文，大多创作于二十年代，如《初恋》，《故乡的野菜》，《苦雨》，《谈酒》等。譬如《初恋》，在似与不似之间，正是初恋的特征，并且道出了当时微妙的心理感觉。宋姨太太说阿三那小东西不是好货，将来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周作人当时听了心里想着：她如果真的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后来阿三患霍乱死了，周作人听了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这正是孩子的心情，至少，阿三不会做婊子了。《故乡的野菜》以妻在菜市场买菜看到荠菜，回忆起故乡的野菜，这些都是极平常的事情，然而经他逐一介绍，串以民歌俗谚，点缀乡间风物，却有一种自然朴实之美，令人也想起自己的故乡来。《苦雨》是给周伏园的书信，记述北京近日多雨的天气，自己很不喜欢，听不惯雨声，因为屋漏，又担心书被淋湿，睡不安稳。然而这种苦也是淡淡的，称不上厌恶。他还谈及小孩子们的喜雨和青蛙的叫声，其实还有几分喜雨的新鲜意思呢！《谈酒》一文中，自己虽不会喝酒，却是感兴趣的，因而也要说一说，以其“微薄”的经验，感觉喝酒的乐趣在当杯的一口，谁又能说不是呢？对与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作人正是以这种平淡的风格，开拓了散文的意境，他以艺术的眼光来品味生活，抒发独特的审美情趣，大有明清“性灵”小品的味道，是艺术化的美文。

在文艺观上，周作人与鲁迅几近敌对。他认为文艺是个人的事，客观的影响社会，但绝不是万能的救世药，没有功利性。然而，尽管不愿牵涉政治，却终被时世所牵连，致使数十年来人们不敢问津。不过，在那样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周作人躲在书房里不问世事，实在不应该。他那时的散文，所谈及花鸟鱼虫，闲适消极，逃避现实。然而其趣味性，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年代，却是很好的消闲品。这种文章表现的是一家之言，有很强的个性魅力。如《苍蝇》一文大谈那脏东西，小时候有点喜欢，现在讨厌，客观予以评价，还谈及古今中外对苍蝇的态度，很长见识。

周作人的散文还有另一类，笔记式的。他曾写过回忆录，其中记述人物的最为出色。他回忆北大红楼内外的名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有些连面也没见过，单凭传说，所记也大都是趣闻轶事，言语诙谐，却很能传达人物的思想精神，表现了幽默的一面，在周氏的散文中并不多见。如记述刘叔雅善骂的特点，关于中医的：你们骂中国的中医，实在大错而特错，要知道在现今的中国，有多少的遗老遗少，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而他们的性命全掌握在这一班大夫手里，所以，你们怎么好意思去骂他们呢？

总之，周作人的散文是纯粹的，自由的，无功利的艺术品。我相信，这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文字，能得到长远的流传。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_下载链接1](#)

书评

[周作人自編集：苦口甘口_下载链接1](#)